

茶道研究的进展与困惑

■关剑平

黄杰新著《两宋茶诗词与茶道》分“两宋茶诗词与茶道论”和“两宋茶诗词中的茶事杂考”上下两篇，前篇为正论，下篇拾遗补缺，还有资料性的附录和详细的参考文献。

在中国茶文化学术著作中，是书的史料特点如书名所示，使用了大量的两宋诗词。七篇附录对于包括在书中使用的两宋茶诗词在内的所有两宋茶诗词作者及其所作茶诗词做了系统的统计。这个工作不仅是作者在出版《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宋画中的信仰民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之后继续研究的基础，也通过展示了自己的研究基础，增强了对于其研究成果的信任度，同时还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基础史料，最终为把中国的茶文化学术研究引向深入、规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参考文献客观、直观地反映了本课题把茶文化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这也使得其研究别开生面。

出于规范的学术训练和缜密的思考，研究首先交待基本概念：“我们只把那些主旨在咏茶，包括咏茶叶、咏茶具、咏茶汤、咏茶具、咏茶人、咏茶园、咏茶山、咏茶画、咏茶政、咏饮茶之意境等的诗词称为茶诗词。”当然，对于茶诗词的判断标准并不容易把握，但是作者对她的判断传达给了读者。附录中对于每位诗人的作品数量都有明确

的交待。

第一章“茶诗词与茶道正名”从道出发，对于唐代煎茶道、宋代点茶道做了阐述，然后出于现实关怀，讨论了茶道与茶艺的关系，指出“茶道之当代迷失”，痛心疾首之情跃然纸上。这是研究缘起的说明，对于理解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两宋茶诗词与茶道精神”开始进入主题。本章通过生、和、俭、闲、静、清、淡、敬、省、坚、仙(两腋生风)、禅(茶禅一味)等12个关键词，逐一论述了中国茶道精神。与和、敬、清、寂日本茶道的目标或者说是基本精神相比，显得所谓的中国茶道异常丰富多彩，不过由此而确认中国茶道的真实存在似乎还有一定距离。是书整理以茶诗词为特征的宋代文献，努力“破除历史的迷障”，让读者“见其庄严妙相”。然而要让世人理解中国茶道，恐怕除了文献学、历史学学者的努力，还需要哲学的解说与总结。

第三章“两宋茶诗词与茶艺”系统梳理了种植、采摘、加工、建盏、水品、煮水、研磨、点茶、煎茶、搭配、茶食、空间等形而下的内容。其中搭配其他原料点茶鲜有提及，对于点茶与煎茶等不同茶汤加工方法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最后指出：“两宋人对饮茶艺术真是格外的讲究，其中建茶制作的

侈靡，确乎破越了和于自然、归于本真的茶道精神，终致废于明太祖的一道政令。但其广泛地被废止，应该说本质上还是茶道价值体系的约束。而其他的茶艺讲究，则至今仍然活在我们的饮茶生活中。”末茶的消亡是中国茶史的重要命题，毫无疑问，对于末茶发展极致时代的两宋末茶的研究对于认识、解明这个问题不可或缺。

第四章“两宋茶诗词与茶人文化人格”重回形而上，分析茶人的文化人格或性格，无论是表现为非地域性、非阶层性、非事功性、非关道德性、兼融性、群体性的茶人人格，还是求道之心、乐道之心、乐生之心、感物之心、审美之心等丰富的内涵的总结都具有开创性。作者认为茶诗词是更完美的研究史料。

第五章“两宋茶道与两宋茶诗词创作之新变”的论述对象回归到了诗词本身，回到了原点的中国文学学科。通过研究两宋最负盛名的茶人、诗人、词人的苏轼、黄庭坚、陆游的作品，发现他们均以释门之机缘，开拓了个性鲜明的新境界、新题材，她称这个新境界为“诗禅茶一味”。

下篇既有对于实物的乌龙茶、茉莉花茶、黑釉茶具等的考证，也有对于僧俗饮茶技艺的考察，还有文学的研究。

《两宋茶诗词与茶道》具有社

会关怀而不庸俗，恪守学术规范；以诗证史，别开宋代茶文化研究蹊径；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茶道是茶文化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在论述深度与广度上，恐怕无出《两宋茶诗词与茶道》之右者。而该研究的最大难度还是在缺乏先行研究上，任何研究都无法一蹴而就。茶文化是个社会上广泛关注，学术界却普遍无视，甚至鄙视的课题，至今茶文化的基本内容都没有得到系统梳理，因此是书的社会性学术基础(不是黄杰个人的学术积累)非常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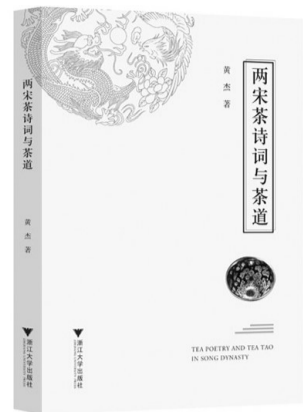
反省茶道研究也要回到1990年前后。当时，东亚茶文化爱好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中、日、韩根据现实情况，分别使用茶艺、茶道、茶礼指称自己的茶文化，以避免混乱。首先是日本在使用茶道这个名词，而且用得成功，影响很大，东亚各国都耳熟能详；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打造了韩国茶礼；中国茶艺是台湾爱茶人以闽南功夫茶为基础，吸收一些日本茶道元素打造的饮茶方式。当然，这个规则并没有让所有的人接受，甚至随着茶文化价值的普遍认可，中、韩使用茶道名称的人反而有增无减。这样一来，混乱就在所难免，要想避免混乱，必须冠以国名，这就成了中国茶道、韩国茶道、日本茶道。是书也没有出现这些说法，

似乎反映了作者认为无论古今还是中外，所谓茶道都是一脉相承的，日本只不过延续了唐宋的茶道而已。中国对茶道缺乏系统研究，那就看看日本的茶道概念吧。

根据《角川茶道大事典》，茶道也称茶汤，指以主客聚集举行的茶会为中心，综合独特的道具及其装饰方法、主客的点茶与礼仪以及茶会场所的茶室等要素，追求独特的表演与理念的艺能。从定义上看，以强调精神性著称的日本茶道可操作性非常强。日本茶道是个真实的产品，而中国茶道研究的难处在于没有产品性的存在，要从今天不存在的唐宋茶道出发总结研究，包括为茶道定义，是典型的历史研究，可是又缺乏历史学家的深度介入。当然，可以“发明传统”，打造中国传统茶文化，打造茶道，事实上不管如何理解，今天确实在设计茶艺，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全国此起彼伏的茶艺大赛，茶农、茶商、茶学家、茶艺师是主力军。

茶艺是拥有3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茶俗是民间世代相传的饮茶风俗。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第一，这样的茶俗、茶艺能支撑起中国茶文化(茶道)研究吗？第二，就这样一个内容有限的基层文化还没有系统完整的调查报告。所以，第三，当代茶文化究竟要打造出怎样的产品？

日本学者分析中日文化的方



《两宋茶诗词与茶道》，黄杰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78.00元

法与逻辑值得我们关注，其意义绝不局限于中日茶文化关系的研究。日本通过充分研究茶道，缔造了茶文化研究的基本准则，欧美不见得在意，东亚却深受影响。事实上，在展开论述一个事物时不可能没有参照物。日本茶道理论自然然而地成为东亚茶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甚至标准。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展开自己的研究，包括对于日本茶道的研究，由此建立起中国的价值观。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光鲜亮丽的日本茶道，就历史来说有不少虚假的成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强大的茶道产业的影响；但是就理论来说却是真的，因为日本学者梳理了茶道的逻辑，在理论上把茶道的发展过程、文化特征说清楚了，并且不仅成为日本茶人的精神支柱，而且让世界接受了。而中国茶文化界的学术研究成果仍嫌少，在这种情况下，《两宋茶诗词与茶道》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狂欢的艺术，沉重的图符

■陈曦

剪纸的尴尬和悖谬在于，它一方面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节俭和人生礼俗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几乎家家都离不开它的点缀，一方面又受到居于庙堂之高的社会上层和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有意无意的忽视。很少有人真正将其作为一种艺术给予足够的珍重，充其量它就是一种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当剪纸被归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的时候，它应该迎来重新解读和深入研究的春天。张志春教授的著作《剪纸》就好像是为了剪纸“正名”应运而生的。

这本书既是对剪纸历史高屋建瓴和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分析，又对剪纸的人本性、仪式性、艺术性等固有特性的深度的学理探究，还是按照文艺创作规律，对剪纸艺术家人生经历中的个案分析和艺术理想的精深诠释。作者将剪纸艺术放在和书法、绘画同等的高度上进行审美观照，将剪纸艺人放在作家、诗人的高度分析研判。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浪漫的、洒脱的、唯美的诗艺品质，更能体味到一种浩大的、温

暖的人文情怀。

陕西作为中国剪纸的高地，并且能代表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因为陕西的剪纸艺术绚烂多姿，大师层出不穷，流派纷繁众多。剪纸是自由洒脱奔放的艺术，看起来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凭着一种集体无意识，凭着从远古传承而来的彩陶文化和青铜文化，拿起剪刀随心所欲，想剪什么就剪什么，这在陕北称为“冒铰”。这与“信天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剪纸的人本性，作者分析了它与诸多艺术种类的差异性，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剪纸的人本性指向的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家庭的具体需求，是真正的为生活而艺术。其中涉及到作为超自然意向的抓髻娃娃，在诸多剪纸题材中尤其显得与众不同。它实际上是一种赋予了神性或者魔性的神秘存在，它对人的照拂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讲，抓髻娃娃都有辟邪的功能，但是其中的燎疖娃娃有时候却成为邪祟的替身，要被烧掉。所以，研究剪纸，地域性差异也是重要的方

面。

人们对剪纸艺术性的感受在于它的多视角、多向度、多时空的表现手法。正如书中所说：“作者的目光好像全能叙述者的目光，神灵的目的一样，穿透一切空间建构，超越现实中的障碍。”这种论述准确地概括了剪纸艺术性的一个本质特征，我将其概括为“全视角构图，全时间叙述”。每一个剪纸艺术家实际上在创作过程中好像都成了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甚至她们都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可以对人间事项，现实物体任意安排和调度。所以剪纸表象是唯物的，本质是唯心的。剪纸就是典型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艺术实践活动。

叔本华说，意志在客体化的否定过程中实现着自己。而剪纸恰恰是剪纸艺人对客体化的否定，因为剪纸的内容是对客体的极大改造，是对其客观性的否定，这个主观对客观的变形、重组和改造最终达到了意志的目的。在实现意志的目的的过程中，剪纸艺人的劳动和创造是一

种被借用的手段，而她们自己却不自知。那么意志在哪里？意志就在古老传统的背后，就在深沉的民族精神积淀的背后。当然，在这种具有狂欢性质的创造中，剪纸艺人们的精神沉醉其中，她们通过惊人的想象、精彩的演绎释放了自己，诠释了自已，圆满了自己。所以这种艺术的精神约略等同于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尤其是它与宇宙生命本体相融合的这点上与其相似之处。

人们总习惯于将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剪纸进行对比，这种对比的目的是以现代艺术的高大上来烘托剪纸的文化价值，这在发掘和普及剪纸知识的时候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实际上是缺少自信的表现。西方的现代艺术是在曾经辉煌的写实传统基础上求新求变的结果，而中国的剪纸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说，是西方的现代艺术靠近了中国的剪纸，而非中国的剪纸靠近了西方的现代艺术。

中国的剪纸老太太们从几岁开始就在搞“现代艺术”，代代相传，只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艺术归

纳为“野兽派”“立体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更没有觉得自己的艺术有多么“现代”。而中国的老太太们大字不识，普遍在饥寒交迫和缺少做人的尊严的窘境中长大，单纯靠着自己的悟性、老人的口传和剪纸的花样来从事自己的剪纸艺术的。实际上，她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已从事的是艺术活动，他们是为了生活而艺术，为了具体的张贴悬挂剪纸的实际需求而艺术。只是到后来，她们慢慢爱上了，就当作心灵的寄托了。正如库淑兰这样历经苦难的女人，剪纸更多是一种默默的哭诉。她把自己当作一尊神——剪花娘子，从心理学上来讲，是对沉重肉身的逃避，是尊严极度欠缺之后产生的心理焦虑的激情转化。在艺术的领域，她的确已经近乎神了，她出神入化的技法让她不需要任何门派，她就是库淑兰派。

毕加索不满足于自然界的色彩，自造属于自我意识的特有的色彩。毕加索这样对西方人来讲属于独造的“天才”之作，在中国的大地上已存在了几千年。就艺术的天赋和强大的创造力方面，



《剪纸》，张志春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110.00元

毕加索恐怕要甘拜下风了。正如高凤莲所言，她的飞虎和飞马是从天上下来的，所以就要四蹄飞扬。她们的艺术是天马行空的艺术，是灵敏的机关一旦触发就飞天入地，横扫六合的艺术。

作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剪纸艺术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大量的具有现代特征的艺术作品，无疑是受了剪纸的影响。虽然我对《剪纸》一书的价值不能做出更加全面的评价，但是我要说它远超出我的预期。我想，它一定能够带给读者诸多快乐的知识和有益的启发。

对北极治理机制的新探索和新突破

■郭培清

“冰上丝绸之路”是中俄两国领导人在2017年会晤中共同提出的，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东北亚方向的重要构成。“冰上丝绸之路”是北极区域合作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但是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来保障，这种制度是基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关切与利益诉求基础上的多种制度相互协调、融合共生、变迁演化而形成的国际合作制度。冯多教授、赵万里教授所著《“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设计》一书为之作出了理论与实务的贡献。

《“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设计》是对北极治理机制的新探索和新突破，旨在通过中国与北极各国的互利合作，统筹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以期达到公共利益的最优配置和利益共享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带动北极地区共同开发，本着“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原则精神和行动宗旨，客观认知和评价泛北极地区国家关系，做好对北极地区航

道开发、环境保护、资源潜力、地缘关系的合理评估，这是对北极国家主导治理范式的必要和有益补充，表明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度和对该地区和平与发展主动担当治理责任的明确立场，为北极区域治理提出制度层面的构想以及中国倡议主张、为北极主导国和域外国家协同治理北极地区，提供了新的制度化对话平台和合作机制，有助于获得北极国家对于中国参与北极区域合作的理解与认同。

以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纽带、以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建立区域合作共生制度为保障，本书提出中国北极区域合作的制度方案。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只能靠制度的自发演进。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制度的人为设计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作者认为制度设计是很重要的，它能够加速制度的自我演进过程，及时修正制度偏差，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提高制

度效率。本书将制度设计理论应用于“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设计中，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国际合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才使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秩序框架内而不断发展。制度设计可以推动制度变迁，摆脱制度的恶性锁定状态。制度变迁的模式是复杂多样的，不同的制度变迁类型有不同的变迁过程。制度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生活和工作的途径，通过对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约束，产生了个体行动所不能取得的收益，因此制度能够激励集体行动和合作。

本书基于制度设计理论，探究“冰上丝绸之路”合作风险、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及困境，提出“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设计的原则与策略性选择。作者指出“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存在域内与域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法律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国际权威的法律体系，治理体系和规则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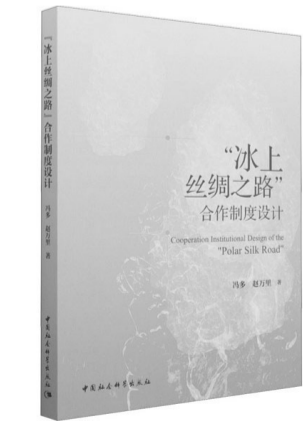
碎片化。

本书构建了“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框架体系，涵盖区域经济合作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法律与人文交流合作制度、北极国际安全保障制度、北极治理与跨区域合作制度。书中阐述了“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建设现状，合作制度设计的主要关切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政策倡议。作者指出“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间存在着互动与耦合关系。在北极区域制度长期演进下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合作制度框架。

“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及主张集中反映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治理的新型合作理念。基于共同保护责任的开发是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之一，将“责任”嵌入北极治理，符合推进“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互利合作的价值导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北极发展与北极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共同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而“冰上丝绸之路”

则是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和远景夙愿的协同发展实践平台。作者指出，中俄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合作进程中，应重点在北极航道开发、陆海通道建设、海洋跨境旅游、海洋技术装备、海洋物流、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油气矿产资源、港口建设、水产养殖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致力于积极务实的推进北极合作，提出新的理念和主张，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这有助于打破北极“圈内”和“圈外”的身份认知惯性，有助于通过寻求制度化方案和共识性举措，长效管控北极地区权力化、利益化和安全化的过度倾向。

出于全球问题复杂化形势，面临全球化逆流现象，中国作为推进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理应在北极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北极作为人类共同的北极，受制于北极主导国的多重博弈，难以在关系人类共同未来的诸多问题上达成有效共识与方案。通过“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可开创中国



《“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设计》，冯多、赵万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78.00元

与北极区域国家新的合作领域，建构新的北极事务参与身份，增强中国在北极的实质性存在。作者提出“冰上丝绸之路”合作的技术保障、资金保障、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并呼吁建立国际协调机制、风险防控机制、应急响应机制以及多边治理机制。中国是重要的北极利益攸关方，必须积极应对北极区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以“共赢共享”为理念，使“冰上丝绸之路”成为繁荣之路、合作共赢之路。